

DANGDAI **LUXUN**
XIANXIANG YANJIU



当代鲁迅现象研究

袁盛勇 ◎ 著



人民出版社

DANGDAI **LUXUN**
XIANXIANG YANJIU



当代鲁迅现象研究

袁盛勇 ©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王怡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鲁迅现象研究/袁盛勇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3
ISBN 978-7-01-017767-0

I. ①当… II. ①袁… III. ①鲁迅著作研究 IV. ①I210.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27296 号

当代鲁迅现象研究

DANGDAI LUXUN XIANXIANG YANJIU

袁盛勇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环球东方(北京)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2

字数:290 千字

ISBN 978-7-01-017767-0 定价:5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序：鲁迅遗产的迷宫

孙 郁

鲁迅谈到人的身后境遇时，言及谬托知己的现象，就感叹到逝者被随意打扮的可悲。但他没有料到的是，自己也遭遇了类似境遇。细数一下鲁迅传播史，关于他的叙述多有附加的成分，仿佛在一个变形的空间里。而几代研究者进入其世界的时候，都不能不面临对一个异质的话语结构。这个难题考验着研究者的领会力与智性，走出话语惯性的迷宫也并非易事。鲁迅存活于非鲁迅的话语世界，或许是他自身精神构成的必然命运。

这是必须正视的话题，20 世纪一些重要的学者，已经触及了此点，但深入的论证不多。我注意到学者袁盛勇的研究，属于较为特殊的一位，他对于鲁迅传播史的描述，已经没有一般人的套路，许多文字都在溢出学界的常规，有着诸多反向性的沉思。那些在大量文献中的顿悟，迈出了传统的先验性的话语，就认知模式而言，是有自己的路向的。

袁盛勇这本《当代鲁迅现象研究》，集中体现了这些年的思考。我在阅读过程中，意识到对于前辈学者的一种深层的挑战。鲁迅逝世后，围绕其传统形成的风风雨雨，系统梳理起来存有许多障碍。我自己也在写同类主题的著作，然而我们的差异显而易见。在他那里，关

于鲁迅自身以及遗产的叙述，有许多出人意料之笔。他以异样的眼光审视那段离奇的历史，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个正误交错、晦明相间的文化之谜。

从以往研究的现状看，许多人囿于条件的限制，真正的突围者微乎其微。就细部的打量而言，袁盛勇走得可能更为深远。鲁迅之后，其实有一个去鲁迅化的鲁迅时代，不了解这段历史，我们可能会迷失在历史的岔道上。而这恰恰是今天的学者必须注意的环节。研究鲁迅，不能不思考鲁迅之为鲁迅的原因，后人对于他的塑造，基于一种复杂的思想脉络，这与鲁迅既有关系，又多含差异。从鲁迅传播史看中国文化的脉息，倒可以厘清左翼文化变迁的历史，它提供的信息，比任何一位现代作家都更为丰富。

对于袁盛勇而言，鲁迅之后的中国面临着选择的冲突，在阶级对立与外族入侵的年代，鲁迅身上的反抗性与慈悲性都得到某些呼应。而政党文化在吸收其资源时，做了选择性的判断。袁盛勇意识到这种选择构成了鲁迅形象的政治化的基调，以致影响了世人对于他本原的认识。鲁迅自己的遗产也非没有瑕疵所在，他的资源被后人摄取的时候，放大了曾有的局限。不看到这一点，塑造其形象就难以出现精神的完整性。

作者对此类问题的思考，可能有多重原因。阅读鲁迅原作和研究者的著作，可以感受到差异的巨大。假使跳出这个领域，从别的文化资源看这些遗存，也会感到光亮之后的暗影。那个资源里的紧张、痛苦、反抗甚至绝望的声音，都易使人进入灰暗之所。在人们开始呼唤明快、多元、通透的文化时，这个遗产有诸多的成分不合时宜。但社会诡异、黯淡的时候，谁能够不承认鲁迅遗风的重要？面对一个亟待自我调整、更新的民族，鲁迅显示了自己特有的价值。

而我们的社会，常常就在这种复杂的形态里。1936年后的许多

时光，恰是这份遗产伴随着无数寻路的人们。他们在这个过程刻下的精神痕迹，既延伸了相关的思想，也带来了新的困惑。鲁迅遗绪在多大程度上还与鲁迅有关，这是一个疑问。

在我看来，对于鲁迅的叙述有多个群落，重要的几方面集中在意识形态领域。一是草根左翼，比如萧红、萧军等；二是所谓正宗左翼，周扬、茅盾都是其中的权威；三是自由派的文人，曹聚仁、周作人乃为代表；四是政治人物，瞿秋白、毛泽东均属于此列。这些人对于鲁迅的叙述，各有特点，差异也是一看即知的。不过在中国当代史上，因为时代的原因，影响最大的是正宗左翼与政治人物对鲁迅的叙述，这成了传播的主流。袁盛勇要做的工作，是对于主流叙述的重新叙述。

显然，这里遇到了诸多的困难。对于战争状态的话语及冷战时期的思想如何表述？什么是鲁迅被意识形态化的深层缘由？袁盛勇在此显得小心翼翼，因为没有对于资料的细细梳理，可能会丧失描写的准确性。但也要大胆地质疑既成的思路，回到存在的原点上，这也是正视鲁迅遗产必须有的态度。

不能不承认的是，鲁迅在被传播的时候，日益简化的时间很长。一种是对其知识结构的简化，在大中小学教学里，鲁迅只是一个文学家，对于他翻译、学术劳作，所谈甚少。另一种是对其思想的简化，如只谈革命性，而鲜及尼采式心态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式心理，立体的鲁迅完全平面化了。这里还涉及鲁迅与俄苏文化的关系，以及左翼选择的两难。以往对于此现象的描述，都在列宁主义的话语体系里，但是我们认真分析则可以看到，鲁迅是在列宁主义之外的思想者，与其只有交叉的关系而非重合的关系。20世纪40年代后，人们一直在列宁主义话语中表达鲁迅的革命性，其实漠视了其左翼的鲜明特点。他与罗曼·罗兰、纪德一样，草根化的色彩多于政党文化的色

彩。搞清此一问题，才能够窥见其身上的原本的形态。

袁盛勇对于延安时期的鲁迅传播研究得很深、很透，一些资料的勾勒都有意味，涉及的问题广泛。在复杂的文本和政策性的文件里，理出了批评史的轨迹。毛泽东如何界定鲁迅的价值，周扬、茅盾的鲁迅观建立在何样的逻辑结构中，左翼文人对于鲁迅解析的差异性何以渐渐消失，这些思考都很细微、贴切。鲁迅新传统的形成，不能不关顾的是这样的元素。而一旦深入其间，历史的谜底才能得以揭晓。

在残酷的革命时代，革命者既需要这样的遗产，也不能不带有目的有所筛选。胡风、冯雪峰都意识到其中的问题，他们后来的命运也证明了鲁迅传统面临的挑战。在梳理这些人物的历史时，有许多环节令人惊异，比如对胡风事件的深层话题的审视，看到了文化转型期内蕴所在。批判胡风，就是批判鲁迅的早期思想，这个判断并非夸张，观点的所指，都在改写我们认识。而这里也看到了鲁迅在后来社会的不幸命运。在大量的分析里，我们的作者发现了鲁迅的被非鲁迅化的现实。一个时期的鲁迅研究，脱离了具体的文本所指，从流行的观念思索作品的本意，放大了不该放大的存在，也隐蔽了不该隐蔽的精神。这里有意识形态意图伦理的作用，也存在着鲁迅自身遗产的歧义性。一个复杂的存在被安装于单一性平台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单体的符号。拆解这个符号，恰是研究者的任务。

这本书的价值也恰恰显示在这个话题里。作者沉潜其间，穷原竟委。他在那些沉睡的史料里，发现了鲁迅传播史敏感的一章。鲁迅如何被一步步政治化的处理，怎样进入革命的逻辑，都有细致的考量。书中涉及了大量的人物与事件，精神丛林里的生态一一出现。他笔下的陈涌、耿庸、刘雪苇、李何林的文本，提供了认识鲁迅的不同版本。而王富仁、钱理群之后研究历史，也得以说明。在这些标本里，作者窥见了时代风气与知识界自身的限度。鲁迅文本的歧义和研究者

视角的差异，都使研究进入一种条理性很强的话语方式中。在研究者看来，只有直面这样的问题，才能够进入问题的核心地带。

为什么许多研究者在那时候对于鲁迅文本的阐释出现了很大的差异？而这些差异后来竟演变成政治事件？这里涉及鲁迅思想的前后的变迁，以及变中不变的问题。在陈涌看来，耿庸、胡风都否定了鲁迅的后期与前期的不同，其实也否定了转变的价值，如是，则知识分子的改造话题可能遭到弱化。陈涌根据党的理论对于耿庸、胡风的批判，旨在将鲁迅前期个人主义因素消解到后期转变的话语里。不否定那些尼采式的精神模式，便会使这份遗产变为无政府主义的“温床”。

《当代鲁迅现象研究》的深度在类似的话题里得到延伸。解析这些现象以单值的价值判断会失之于浅。如果不看到外在的话语环境的强大，就不能解释争论的缘起。但鲁迅自身的矛盾性、自我否定性的逻辑也是问题产生的原因。先前的研究者遇到这些问题时，会把责任均归于外部的条件和政治本身。这样的研究在过去三十年司空见惯。袁盛勇的特别之处在于，他面对鲁迅文本，不是依附其间，以鲁迅的是非为是非，而是拷问着自己的审美对象，寻找鲁迅自身的暗点。比如他对于苏俄的判断的失误，他在尖锐的社会矛盾中形成的多疑的思路，都可能包含一种独断主义的元素。而这些一旦脱离具体语境则会被人们所利用和歪曲。“文革”鲁迅成为各种运动的理论参考，都说明他的话语方式的破坏性。对此，可以认真审视的内容十分丰富，鲁迅传播史要认真梳理，非一两本书可以说清的。

不回避鲁迅的弱点，从其精神缺陷里寻找鲁迅身后的文化悲剧的深层原因，或可能进入话题的深处。袁盛勇把鲁迅的不足定位在权威性与一元论的层面，有自己的逻辑。因为鲁迅之后的文化相当长的时间在这样的悲剧性的结构里，而胡适思想就难以存在这样的逻辑结构。但我以为在紧张的阶级对峙中，鲁迅倾向也不无道理。只是在另

一种空间里还继承其思想的余绪，就可能出现这个问题。讨论这个问题也应小心翼翼，抽象地处置也未必切中了问题的实质。战时或紧张的斗争时期，权威性与一元论或许有存在的道理。但脱离了具体语境，可能丧失有效性。鲁迅认为自己的判断也属于具体语境的一部分，他希望自己的文章速朽，也有其间的道理。将自己的思想扩大到日常生活里，他也未必能够同意。但不幸的是，后来的悲剧，还是在此产生了。

回望鲁迅的传播史和研究史，对于认识文化的内在冲突和自我调适都颇有意义。鲁迅一生卷入文化的冲突中，其言其行都打上很深的批判意识的烙印。这种模式一旦外化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由草根话语变为政党文化的话语，就有了巨大的冲击力。“文革”中鲁迅的命运，都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袁盛勇以许广平、周建人的著作为例，从那些爱护鲁迅者的言行，看到了对于鲁迅背离的可悲性，又在这种可悲性里，发现检讨鲁迅精神结构的局限性的必要性。然而对于研究者而言，做到此点，需要有相当丰富的思想维度。就这个意义来说，袁盛勇的劳作具有不可忽略的意义。

所有进入鲁迅文本的人都意识到，鲁迅的精神具有一个复杂的结构。但一个奇怪的现象是，他身后的中国文化主潮，则在一个简单化的平面上。而对于鲁迅的叙述的单一性一直存在于几代人的思想中。认识到这个现象十分重要，如果研究者不清楚自己的研究也存在历史的有限性，面对文本也会出现自身的盲点。鲁迅的价值在于对于盲点所具有的消解的功能，在这个过程里，他自身的弱点也蕴含其间。鲁迅自己就曾坦诚其话语具有一定的毒性，承认自己的攻击性后面的阴影，也说明了那精神的通达。我们在这个层面讨论他的遗产，就可能脱离以往研究的局限。

不过，这里也存在着一种危险性，如果不是深入考量时代的语境

的特殊性，以今人的价值观遥望其思想背景，可能出现新的误读。论述者自身的逻辑能否契合历史的原貌也是一个疑问。袁盛勇在这里也不忘对于自己的论述的界定，他知道讨论鲁迅的有限性时，必须注意表述的分寸，这是看到问题的两面的。作者说：

我倒认为在研究有关鲁迅现象的过程中，必须有意愿地把无限扩大鲁迅思想之消极因素的文化人跟鲁迅本人区别开来，不能把鲁迅接受史上出现的种种弊端完全不加分析地归结到鲁迅身上，文学家和思想家鲁迅所内在具有的某些局限尽管客观地存在着，但是，由于后来者的功利性运用所产生的负面效应并不能简单地归罪于他。鲁迅并没有强求人们把他的某些观念尊为一个时代的道统，他倒是多次希望人们更快地忘记他以及他所批评时弊的文字。鲁迅自我思想历程的沉沦和他曾在当代历史中的不断沉沦既有交集，也有本质区别。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该正视其自我沉沦的存在。不知何故，我们的社会中总有一些卫道士存在，他们在心底总是默默而坚定地诘问：作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不是完美的吗，怎么会有缺陷呢？！

鲁迅之于当代历史，的确是一个特有的现象。五四之后，他与胡适、周作人形成的传统，对于后人的辐射一直没有消失。就复杂性而言，鲁迅超过了许多先驱。这不仅现代以来稀有，古代中国，除了孔老夫子，恐怕无人及之。而面对这样的研究对象，我以为应当有相当的知识准备和思想训练。袁盛勇其实意识到自己的判断的有限性。他极力避免论述的简单化和道德化的表述，都是有着深层的考量。在审视对象世界的时候，我们自己其实也是被审视的对象。我以为选择了这个话题，就选择了对自己的挑战。

直到今天，探讨鲁迅的有限性依然是不易完成的话题。所谓自由主义者攻击鲁迅，都不能说明精神的内在本质。鲁迅的同时代人，能与其对话者甚少。而身后八十年间的研究者，至少在知识结构上，尚无人达到同样的水准。鲁迅现象在今天依然是个带有困惑的复杂的存在，他之于身后的历史，有我们文化里宿命的元素，其思考与审视的问题，在今天不是弱化，而依然有着某种严峻性。在这个意义上说，鲁迅研究期待更多人的介入，从文本到历史投影，从民国环境到今天的语境，我们要拓展的空间依旧很大。这考验着我们文化里的基本性原理的认同是否可能，也预示着我们未来走向的可能性。走出鲁迅遗产的迷宫，其实不是告别鲁迅，而是重新回到其博大、温馨的世界。在鲁迅的语境消失的时代言说鲁迅，我们也肩负着再造新批评话语的艰难使命。

2016年8月7日

（孙郁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前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

目 录

绪 论	当代“鲁迅现象”的发生	1
一、	不死的青春：鲁迅笑了	1
二、	当代“鲁迅现象”的发生	7
第一章	延安时期“鲁迅传统”的初步形成	21
一、	鲁迅启蒙小说传统的不断弱化	23
二、	鲁迅杂文传统的不断弱化与转换	31
三、	政治性：毛泽东的鲁迅观	43
四、	诠释与转换：新的鲁迅传统的形成	52
第二章	思想改造运动中的“鲁迅”	73
一、	思想改造：知识分子的宿命	73
二、	民粹主义思想烛照下的鲁迅	89
	——以《一件小事》的接受与诠释为中心	
三、	鲁迅：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模范	103
四、	绝对忠诚和服从：鲁迅是一名“小兵”	118

第三章 胡风批判运动中的“鲁迅”	137
一、批判胡风就是批判早期的鲁迅	137
二、《狂人日记》的意识形态性	149
——批判者和胡风派的论争焦点之一	
三、《阿Q正传》的革命性	156
——批判者和胡风派的论争焦点之二	
四、《野草》的主体性和革命性	166
——批判者和胡风派的论争焦点之三	
五、文化创造的主体性	189
——批判者和胡风派论争的根本分歧	
第四章 被压抑的生与死	225
——鲁迅思想及鲁迅现象史中的几个问题	
一、鲁迅的死和他的老脾气	226
二、鲁迅的“沉沦”	244
——“我要骗人”和鲁迅言与思与行的背离	
三、鲁迅思想的遗憾	265
——从他与周扬的根本分歧谈起	
四、经典性和历史性之间的鲁迅研究	288
——以李何林《鲁迅〈野草〉注解》为中心	
结 语 “鲁迅现象”的历史性和当代性	299
一、作为傀儡之鲁迅现象的终结	299
二、作为问题和幽灵存在的鲁迅	303
三、回到复杂而完整的鲁迅那里去	310
四、致力于承续并超越鲁迅的文化建构	318

主要参考文献.....	324
-------------	-----

后 记.....	333
----------	-----

绪论 当代“鲁迅现象”的发生

一、不死的青春：鲁迅笑了

1949年10月，苏联汉学家罗果夫曾在北京一个纪念鲁迅逝世十三周年的晚会上说：“人民解放军的力量，不但解放了中国的土地和人民，连死了的鲁迅也被解放了。”许广平对此深表赞同。因为这让她想起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作为首都的重庆”，人们在纪念鲁迅的时候，往往会遭到国民党特务的阻挠和破坏，他们不是“霸占会场，捣毁什物”，就是“驱逐出席人士，禁阻主席到会”；可现在呢，在鲁迅逝世十三周年的时候，在这解放了的新中国首都和全国各地，人们举行了各种各样的纪念会，“情况空前的热烈”，真是给人以冰火两重天之感。在此种自由纪念鲁迅的氛围中，许广平以为“充分研究鲁迅、批评鲁迅、介绍鲁迅”就有了非常现实的可能。在这个意义上，许广平自会认同罗果夫所言，“鲁迅的确也被解放了”。^①这个被解放，其实就是指鲁迅不会再遭受国民政府时期的那种禁锢和压抑

① 许广平：《〈鲁迅作品及其他〉读后感》，载胡今虚：《鲁迅作品及其他》，泥土社1950年版，第103—105页。

了，在国民党统治下，宣传鲁迅和研究鲁迅都会成为一种冒险行为，成为进步文化人的一条罪状，而现在，许广平认为当然不会了。鲁迅的时代已经来临。在这个意义上，鲁迅的时代乃是随着中华民族新时代的到来而到来的。

在新中国初期的知识分子看来，这一时代的到来将会给予鲁迅以更加自由而广阔的阐释空间，将会把鲁迅从那种被长久压抑的状态下释放出来，并为创制崭新的社会主义文化而奉献其有益的思想元素和精神力量。当时，胡风以为，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新的时间和新的纪元开始了，而在何其芳眼里，新中国成立之日就是一个最伟大的节日。这是可以理解的，随着毛泽东宣告“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①因自晚清以来中华民族在外国列强侵略下所产生的屈辱感，在顷刻间烟消云散，中国人的脊梁骨终于傲然地挺立起来了。这是一个民族最为开心和壮丽的时刻！曾经在延安，在广大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流行的一支歌曲这时也唱遍了大江南北：“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在这样的状态下，整个民族的精神顿时亢奋起来，乐观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情绪在广大民众和知识分子间充盈弥漫，而在当时的一些颂歌类型的作品中，人们总能热切地感到此种理想主义精神的激荡飞扬。

郭沫若是一个具有敏锐政治嗅觉和时代精神的浪漫诗人。“五四”时期，他以一种“天狗”般的姿态俯瞰宇宙和人类，唱出了对于整整一代年轻人的青春礼赞；新中国成立前夕，早已背叛了“五四”时期艺术追求的诗人，又以一种典雅整饰的诗赋形式，唱出了对新中

① 毛泽东：《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3、344页。

国的颂歌，这就是大家熟知的《新华颂》：“人民中国，屹立亚东，/ 光芒万道，辐射寰空。/ 艰难缔造庆成功，/ 五星红旗当地红。/ 生者众，物产丰，/ 工农长作主人翁。”紧跟而上的是何其芳。本来，当他奔赴革命圣地延安时，他就宣告自己再也“不爱云，不爱月/ 也不爱星星”，只愿“有一个茅草的屋顶”（《云》），从而把自己的生命融入到一种全新的集体生活中去。所以，当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诗人顿时心潮澎湃，诗思泉涌，不禁创作了激情四溢的诗篇：“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隆隆的雷声里诞生。/ 是如此巨大的国家的诞生，/ 是经过了如此长期的苦痛/ 而又如此欢乐的诞生”（《我们最伟大的节日》）。这是诗的开头，非常准确地点明了歌颂新中国诞生的主题。胡风是一位具有诗人气质的严肃而热情的文艺理论家，也是鲁迅晚年最为亲密的年轻朋友，他在跨入新中国门槛的时候，也以一种粗犷的嗓音唱出了心中激越的音符，这就是他创作于1949年底至1951年初的抒情长诗《时间开始了》。在当时这个特定的历史时刻，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那种乐观、自信的革命情怀也被表现得淋漓尽致。这种自信和乐观不仅表现在对于未来经济、政治和制度建设等的瞩望上，而且在文化建设上也充分体现出来。对此，毛泽东曾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有着非常激动人心的预言：“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①“鲁迅”就是在这激动人心的时刻被从历史深处挽着手微笑着走来：他的文学、思想和气质均被人们赋予了无限浪漫的遐想。

^① 毛泽东：《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5页。